

人性八惡

怠惰怒
憤情欲
貪吃傲
驕

貪婪
嫉妒
絕望

廖月娟等
譯

John Updike等著

生活視窗④

人性八惡

John Updike 等著 · 廖月娟等譯

生活視窗④

人性八惡

1997年10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160元

著 者 John Updike 等
譯 者 廖月娟 等
插 圖 者 Etienne Delessert
執行編輯 林芳瑜
發 行 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418662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726-7(平裝)

DEADLY SIN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出版說明



出版說明

中古時期的義大利哲學家多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 1225-1274）首先提出人性七惡的說法。這七項致命的罪惡是：怠惰、憤怒、情欲、貪吃、驕傲、貪婪與嫉妒。三十多年前《泰晤士報周日版》（*The Sunday Times*）邀請了 W. H. Auden、Cyril Connolly、Patrick Leigh Fermor、Edith Sitwell、Christopher Sykes、Evelyn Waugh、Angus Wilson 等七位英國作家重新詮釋了這七大惡的意義。

1993年夏，《紐約時報書評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再度邀集八位傑出作家，以當代文化為背景，為這些人性之惡作更進一步的申論。其中女作家歐慈（Joyce Carol Oates）認為應該再加上另一項不可寬恕的罪惡——絕望，於是成為人性八惡。

目次



目 次

出版說明／1

- | | | |
|----|--------------------------|----------|
| 怠情 | Thomas Pynchon | 張芬齡譯／4 |
| 憤怒 | Mary Gordon | 廖月娟譯／22 |
| 情欲 | John Updike | 宋碧雲譯／44 |
| 貪吃 | William Trevor | 丁連財譯／60 |
| 驕傲 | Gore Vidal | 彭淮棟譯／76 |
| 貪婪 | Richard Howard | 彭淮棟譯／88 |
| 嫉妒 | A. S. Byatt | 黃裕美譯／100 |
| 絕望 | Joyce Carol Oates | 冷步梅譯／126 |

人性八惡 • DEADLY SINS



怠惰

THOMAS
PYNCHON

湯瑪斯·聘瓊





在《神學總論》(*Summa Theologica*)對此一主題所做的經典論述中，阿奎納^①稱 Sloth (怠惰)——或 acedia (懶惰)——為七大罪之一。他說因為這類罪行會引發其他罪行，所以他用 capital 表示「主要的」或「為首的」；然而字面底下有另一層更黑暗的意義陰森地迴盪著，但也無損論證之力量，因為這個字同時含有「理當處死」的意思。由是推之，mortal (必然滅亡的) 和語意較為混濁的英文 deadly (致死的、使人墮入地獄的) 皆為其同義詞。

但是得了吧，將死亡和怠惰這類輕量級事物相提並論，不是有點走火入魔嗎？坐在某排中古世紀死刑犯的牢房裡，有這樣的對話：

「嘿，無意冒犯，請問他們為什麼突然把你扔進來？」

「哦，還不是老套，他們來的不是時候。結果我拿出某警長半數的配備和我那二腕尺長的石弓，將四分之三吋的短箭射向自動運料槽。憤怒吧，我想……那你呢？」

「嗯，呃！不是因為憤怒……」



「哈！又是一個怠惰的案子，對不對？」

「……事實上，那根本就不是我。」

「絕對不是的，好傢伙。嘿，差不多該吃午飯了。你不會是作家吧？沒那麼湊巧吧？」

作家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怠惰專家。不斷有人就此一主題向他們討教，不僅希望他們免費提出勸告，而且還要他們在怠惰座談會中發言，主持怠惰特別委員會，在怠惰聽證會上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這種不脫窠臼的想法，有一部分是我們引人注目的工作性質所造成的一一按字計酬，截稿時間絕不寬限一一我們理當清楚論件計酬的工作和以時間兌換金錢的工作間的差異。此外，圍繞著作家的「寫作阻塞」，又有種種迷人的掌故傳說：這個苦痛有時候一旦豁然而去，戲劇性十足，毫無預警，挺像便秘，——（因此？）贏得讀者廣泛的同情。

然而，「寫作阻塞」雖然出自一項大罪，作家其實正是順著這條大罪之路，走向他最喜歡的主題公園。和其他六大



罪的每一種一樣，怠惰據說是次要（或輕微）罪惡的整個家族中的老前輩，家族成員有遊手好閒、昏昏欲睡、身體浮躁、心性不穩、饒舌好辯。在拉丁文中，Acedia 的意思是憂傷，有意的自行其是，背離上帝，精神決斷力喪失——這反饋到整個過程，很快地產生目前所謂的愧疚和沮喪，最後將我們推至無所不為的地步（小罪不斷，差勁的判斷層出不窮），以逃避不安。

但是，怠惰的後果雖然糟糕——套一下香格里拉的意境——卻未必邪惡，譬如阿奎納稱為「內心不安」的特質，或「對各類事物毫無章法的胡亂追求」，「如果延伸到想像力……則可稱為好奇。」當然，作家就是在心靈旅行這類插曲式的事件中才被視為表現稱職（有時甚至被認為是他們能力的極限）；他們解決形式的問題，自來世尋求忠告，做催眠式的冒險——幸運的話，事後可以恢復神智。慵懶做夢往往是我們這一行的精神所在。我們出售自己的夢，因此我們的現金實際是以怠惰換取的；據說這種置換在娛樂界有更驚人



的表現，池畔慵懶的喋喋不休往往就賺進數千萬元。

以怠惰為題的文學創作，在阿奎納之後的幾個世紀中有過數次重大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是《哈姆雷特》；但是一直要等到踏上美國的土地，才有進一步重大的演變。在富蘭克林^①的狂熱格言家窮理查，和梅爾維爾^②的注定失敗的抄寫員巴托比之間，隔著大約一個世紀的初期美國（當時正統合成基督教資本主義國家），怠惰正處於轉型的最後階段，由精神層次走向世俗。

在富蘭克林的時代，費城的宗教視野和威廉·潘恩^③當初所建立的差距日遠。這個城市逐漸成為某種高生產力的機器，材料和勞力輸入，貨物和服務輸出，城裡的交通繞著規則的街區方格川流不息。倫敦市區迷宮式的街道——導至曖昧和邪惡——在這裡全得到了修正，成為正交的直角（狄更斯在1842造訪此地時說：「在市內走了一兩個小時之後，我願意用一切去換取一條彎彎曲曲的街道。」）精神層面的事物並不像生產力這類物質層面的事物那麼直接。怠惰不再是



背離上帝或性靈美善的罪過，而是罪在違反了某種時間——齊一，單向的，通常是不可逆轉的——亦即違反了使每個人早睡早起的鐘錶的時間。

窮查理毫不羞赧地表達了他對怠惰的嫌惡。他並不是只將此一主題的著名英國格言加以複述；他隨口迸出具信仰復興運動^⑤風格的自創格言——「喲，懶骨頭！上帝若無意要你善用手腳，你想祂會賜你手腳嗎？」在每日彈性的流程底下，有一冷峻的脈搏不停地跳動，無所遁逃，絕不寬容——現在規避或拖延任何事情，日後必得以更緊湊的步調彌補。「你可以耽擱，但時間可不。」怠惰，在不斷的推拖逃避之中，就像預算赤字一樣越堆越高，無可避免的還債規模也越來越不慈悲。

自窮理查那個時代開始支配城市生活的時間觀念裡（每一秒都一樣長而且無法喚回），時間的流逝少有不成線狀進行的，除非你把無從統馭的歪扭夢境也包括在內——窮理查是很少用得上的。在法蘭西斯·巴勃（Frances M.



Barbour) 1974年所編的格言索引裡，找不到任何有關「夢」的格言。夢和它的老搭檔——同樣地不受歡迎：睡眠被視為與累積財富背道而馳的時間，是購買二十個有生產力的清醒小時而必須在萬物常則中徵課的時間稅。在窮理查的年代，富蘭克林——根據其自傳所言——為自己訂的睡眠時刻是凌晨一點到五點。另外一個無工作的時間空檔是四個小時——從晚上九點到凌晨一點鐘——用來做夜間反省：「我這一天行了什麼善？」這想必是每日作息表中唯一可以胡思亂想的時候——似乎沒有其他任何機會可供沈思、做夢、幻想、虛構了。在那部直角正交的機器裡，生活理當沒有虛構的成分。

到了《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1853年版的《華爾街故事》——時代，怠惰已失去了最後一絲宗教的影射，成為對經濟的反擊。置身財主形同強盜的資本主義核心區，這本書的主角所展現的心態可被認定為末期怠惰，這和西部片的故事情節類似——亡命之徒不斷選擇將



自己推向絕境。巴托比就這麼坐在華爾街的辦公室，嘴裡反覆說著：「我還是不要這樣做比較好。」他的選擇空間急遽縮小，而他的雇主（一個資產雄厚的實業家）也被迫質疑自己生命的前提——因為這個狼狽不幸的抄寫者——這名寫作者！他雖然位居資本主義底層的最低處，卻不願繼續再與日常成規周旋，這引發了有趣的問題：誰的怠惰罪行較重？是那個與萬惡之源聯手、接受現狀以換取薪水支票而圖個無憂無慮生活的人，抑是那個到頭來一事無成卻陷入憂傷的人？《錄事巴托比》是第一部探討現代怠惰的叙事長篇，緊接著有卡夫卡、海明威、普魯斯特、沙特、穆索爾（Musil）這類作家的作品——各位可以自己列出梅爾維爾以降你最喜歡的作家名單，遲早你會遇見一位憂傷特質與我們這個時代相互呼應的人物。

到了本世紀，我們發現怠惰的根本色彩頗富政治性。群衆意志的衰退導致邪惡政策的施行以及邪惡政權的崛起；1920和30年代全球法西斯權勢日盛，這或許是怠惰的黃金時



段，雖然越戰時期和雷根—布希時代在不久之後來臨。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都充斥著未能盡心做好分內工作的人物。我們怎會認不出我們的世界？在公開場合和私底下，每天都有擇善行事的機會呈現在我們面前，但我們卻置之不理；怠惰成了日常精神生活的俗稱。雖然在其最深處仍潛伏著死亡的焦慮，但卻從未像徹底的絕望那樣痛苦，或那樣真實，因為怠惰是以折扣價購進的絕望——在各方面，人們都故意與信仰背道而馳，因為在日常淫慾、憤怒和其他事物的徵逐過程中，信仰會從中作梗。不自主的悲觀主義者最後的防衛之道是——靜止不動，這樣，死神的鐮刀好像就會擦身而過。怠惰是我們的背景輻射光，我們可輕易收聽的電台——它無所不在，而且再也不為人所察覺。

目前任何有關怠惰的討論，若撇開電視不談，都不夠透徹，因為電視具有令人癱瘓的天賦，及其創造的共生體——惡名昭彰的「睡椅馬鈴薯」。我們懶散地躺臥於電視機旁，按摩著脊椎，無聊瞎編的故事所供應的草料，我們全數吸